



白居易与苏东坡 文化史上的“联珠双璧”

刘绪义

近年来,推崇宋代文化者日渐增多,苏东坡亦随之声名益盛。世人或谓“有趣之灵魂,唯东坡一人”,若闻此语,白居易当不以为然。

白居易,唐代宗大历七年(772)正月出生于河南新郑,字乐天,号香山居士,因此又被称为白乐天、白香山。白居易中过进士,也做过进士考官;他因文才得到过皇帝的赏识,也曾因文字受到皇帝的贬谪;他当过江州司马,也做过杭州刺史;他起步于校书郎,以刑部尚书致仕;他提出过“文章合为时而著,诗歌合为事而作”这一著名的文学理论,也写过不少通俗易懂的闲适诗作。

这些都不算什么,我们要说说他和“有趣的灵魂”苏东坡之间的故事。

苏东坡是北宋人,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(1037年1月)出生于四川眉山,二人相距265年。虽身处不同时代,但有趣的灵魂其实是超越时空的。

甘当白居易铁粉 东坡名自乐天传

苏东坡本名苏轼,字子瞻,“东坡”这个名字正是源自白居易。

苏轼谪居黄州后,自号“东坡居士”,南宋洪迈在《容斋三笔》中指出,“详考其意,盖专慕白乐天而然”。唐宪宗元和十四年(819),谪居江州已有四年的白居易转任忠州刺史,施元之在《施注苏诗》中这样说:“白乐天谪忠州,州有东坡,屢作诗以言之,故公在黄州亦作东坡,用乐天之遗意也。”白居易写了两首《东坡种花》诗,一首中有“持钱买花树,城东坡上栽”,一首中写“东坡春向暮,树木今何如”。另有《步东坡》《别种东坡花树两绝》等诗,详细描述种花、赏花之趣,表现出身处逆境的诗人随缘适意的悠闲心境。宋人周必大说:“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,独敬爱乐天,屢形诗篇。盖其文章皆主辞达,而忠厚好施,刚直尽言,与人有情,于物无着,大略相似。谪居黄州,始号东坡,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。”宋人王十朋在《游东坡十一绝》其二中也称苏轼“出处平生慕乐天,东坡名自乐天传”。

苏东坡一生“景仰香山者,不止一再言之”,是白居易最忠实的“铁粉”。苏东坡诗中多次将自己与白居易相比:“我似乐天君记取,华颠赏遍洛阳春”“我甚似乐天,但无素与蛮”“定似香山老居士,世缘浅淡道根深”,等等。在最后这句诗的下面,苏东坡还自注:“乐天自江州司马除忠州刺史,旋以主客郎中知制造,遂拜中书舍人。轼虽不敢自比,然谪居黄州,起知文登,召为仪曹,遂忤侍从,出处老少大略相似,庶几复享此翁晚节闲适之乐焉。”

苏东坡不仅取名追慕白居易,作诗也学白居易。苏东坡的诗中或者直接借用白居易诗的原意,或者反其意用白居易诗句,或者袭用白居易诗中意象、事典,比比皆是。白居易写《步东坡》:“朝上东坡步,夕上东坡步。东坡何所爱,爱此新成树。”苏东坡则写《东坡》:“雨洗东坡月色清,市人行尽野人行。莫嫌荦确坡头路,自爱铿然曳杖声。”青出于蓝,意境更胜一筹。苏东坡有一首著名的词《定风波》,上阙写道:“莫听穿林打叶声,何妨吟啸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轻胜马,谁怕?一蓑烟雨任平生。”词人由眼前风雨推及人生风波,那种面对人生的风雨而我素、不畏坎坷的超然情怀,千百年来吸引人们膜拜不已。然而,这种境界其来有自,一如苏东坡在另一首《定风波》中写的千古名句“此心安处,便是吾乡”,即源自白居易《初出城留别》一诗,“我生本无乡,心安是归处”,表现的就是这样一种达观顺命、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。白居易有《池上篇》,苏东坡亦作《池上二首》,其中一

首写道:“不作太白梦日边,还同乐天赋池上。”诗人不慕李白,却对白居易所营造的“池上境界”表达了倾心向慕。

白居易兼取儒道佛三家,对道家亦有自己的心得,《读庄子》一诗中他这样说:“庄生齐物同归一,我道同中有不同。”和白居易一样,苏东坡乐观的处世信念和超然旷达的人生态度亦可见道禅的旨趣,其《再和杨公济梅花十绝》中的“春入西湖到处花,裙腰芳草抱山斜”,就出自白诗“谁开湖寺西南路,草绿裙腰一道斜”一句。白居易《盐商妇》一诗写“南北东西不失家,风水为乡船作宅”,苏东坡《鱼蛮子》一诗开篇即道“江淮水为田,舟楫为室居”。

类似这样表现出对白居易思想观念、人生态度深切认同的诗句,苏东坡还有很多,无不流露出对白居易的倾心敬慕之情。事实上,白居易不仅是苏东坡的偶像,同时也是宋代诗人群体的偶像。白居易的诗在宋初诗坛流行甚广,是诗人们竞相学习效仿的对象。宋人蔡居厚说:“国初沿袭五代之余,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。”一语道破其时尚。

官场亦是隐身地 我心与世两相忘

与盛唐诗人要么仕途精进,要么隐逸出尘的人生态度不同,亦和北宋文士乐于树朋结党、异论相搅的士风不同,白居易虽身在官场,却向往那种悠游自在、享乐自洽的生活,践行孔子所欣赏的“君子矜而不争,群而不党”之人格,做到了“放心于自得之场,置器于必安之地”。

白居易的一生,除元和十年(815)因越职言事等原因遭江州之贬,小小地被打之外,基本上是风轻云淡、惬意自适的。这正得益于白居易独特的处世态度,因此,宋人对白居易“处世艺术”击节叹赏。叶梦得在《避暑录话》中说:“白乐天与杨虞卿为姻家,而不累于虞卿;与元稹、牛僧孺相厚善,而不党于元稹、僧孺;为裴晋公所爱重,而不因晋公以进;李文饶素不乐,而不为文饶所深害者。处世如是人,亦足矣。”白居易与杨虞卿是姻亲,却不受他牵连;白居易和元稹、牛僧孺相交亲善,却不和元、牛结党;白居易受到名相裴度的赏识,却不因此升官晋爵;宰相李德裕不喜欢他,却没有受到李氏的陷害。一句话,白居易无私无党,不攀不附,这种潇洒的处世之法,世所罕见。

唐朝中期以降,朝臣间朋党之争,未有稍息。白居易历经“牛李党争”“二王八司马事件”“南衙北司之争”等,却能置身事外、不党不争。白居易与刘禹锡交游甚多,世称“刘白”,刘禹锡是“八司马”之一,白居易却没有陷于“八司马”之案;白居易和元稹友情甚笃,世称“元白”,锋芒毕露的元稹在宦官专权和“牛李党争”中一生数贬,白居易虽批评过宦官专权,却没有陷入“南衙北司之争”(唐代以宰相为首的政府机构称为南衙,宦官掌握的机构称为北司);白居易的妻兄杨虞卿是牛党魁首,白居易也没有卷入“牛李党争”。一党在位,权势熏天,白居易却能做到“和而不同”。如其诗中所道:“蜗牛角上争何事,石火光中寄此身”。

相反,苏东坡虽然既不属于新党,也不属于旧党,可是,新党执政,苏东坡得罪新党;旧党在位,亦排斥苏东坡。处于新旧党争的夹缝当中,苏东坡却做不成白居易。究其原因,在于“东坡多干世之意”,加之性格上“稍露锋锷,不及太傅混然无迹”,难如白居易那般做到“我心与世两相忘,时事虽闻如不闻”,故而苏东坡一生屡遭贬谪。

与苏东坡仕途坎坷相比,白居易仕途

平顺,他还提出了“中隐”的思想。大和三年(829),白居易写下《中隐》诗:“大隐住朝市,小隐入丘樊。丘樊太冷落,朝市太喧嚣。不如作中隐,隐在留司官。似出复似处,非忙亦非闲。不劳心与力,又免饥与寒。终岁无公事,随月有俸钱……人生处一世,其道难两全。贱即苦冻馁,贵则多忧患。唯此中隐士,致身吉且安。穷通与丰约,正在四者间。”他这是把官场当作隐身地,将穷通看作等闲事。就在这一年春天,白居易即称病请长假,接着求为闲职,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洛阳,“自此,不复出”,毅然决然且一去不回头地离开了政治斗争中心长安。

与苏东坡相比,白居易的朋友圈更为广博。他晚年居洛阳履道里,与胡杲、郑据等年龄都在七十岁以上的友人组成“七老会”,“七老相顾,既醉甚欢”,后又增加禅僧如满、李元爽二人,成为“九老会”,诗酒唱和,绘《九老图》,其晚年风雅,为宋人所慕。

情系红颜怜薄命 深情不输苏东坡

白居易重情重义,关怀女性命运,同情其遭遇,深情不减苏东坡。

读过著名的长诗《琵琶行》,读者定不会忘记“枫叶荻花秋瑟瑟”的浔阳江头,诗人白居易夜中送客,“忽闻水上琵琶声”,被美妙的乐音所吸引,见到了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的歌女,由此引出了“同是天涯沦落人,相逢何必曾相识”的深情关切。

还有那首著名的写李隆基与杨玉环爱情的长诗《长恨歌》,诗人从“回眸一笑百媚生,六宫粉黛无颜色”的女主人公身上看到了美貌爱情的凄美结局,到最后发出“在天愿作比翼鸟,在地愿为连理枝。天长地久有时尽,此恨绵绵无绝期”的深情咏叹,在历代读者的心中荡起阵阵涟漪。由此更可发现,倘若没有诗人白居易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同情,则不可能有这一千古杰作。

对于自己的妻子,白居易也颇付真情。当我们读到她写的一首《赠内》诗时,还会发现这是一个有大智慧大情趣的人:“漠漠暗苔新雨地,微微凉露欲秋天。莫对月明思往事,损君颜色减君年。”

所谓“赠内”,就是写给自己夫人的。白居易37岁才娶了同僚的妹妹杨氏,算是晚婚的典型。诗的背景就是白居易与夫人闹矛盾,夫人不吵闹也不撒泼,和他冷战,于是白居易赶紧写了这首诗来哄夫人。诗写得颇有情趣,从雨天着笔,大概是想说,你不理我的时候,天都是阴的,天都在哭泣,我的心也是凉的。落脚到规劝:你莫要生气呀,生气不仅不美,还会折寿呢!短短四句,可谓句句切中女人心思。

白居易待自己的侍妾同样出于真心。白居易有二侍妾,一名樊素,又称柳枝;一名陈结之,又称桃叶。白居易晚年患风疾,而樊素还很年轻,白居易不忍重演死别的悲剧,决定趁自己活着时,放其归家另嫁。他还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,居然将侍妾陈结之的名字刻于石上以表纪念:“闲拨船行寻旧池,幽情往事复谁知。太湖石上镌三字,十五年前陈结之。”后人对此大为赞叹。他还给她们写诗送别或表达牵挂,如《别柳枝》抒发与樊素临别时的感情:“两枝杨柳小楼中,袅袅多年伴醉翁。明日放归归去后,世间应不要春风。”白居易笔下的女子没有情色的意味,总是饱含真情、清丽雅致,令人感慨。如此对女性命运的关切,亦可谓前无古人。

富贵诗酒皆自得 世间第一有福人

世人多以为古代仕宦衣食无忧,亦有谓宋代官员俸禄优厚者,而苏轼平生却艳羡白居易之生计从容。

白居易收入有多高呢?因为白居易常于诗中记述俸禄,其收入清晰可考。做县尉时,白居易晒出的工资是“吏禄三百石,岁晏有余粮”;任校书郎时,“俸钱万六千,月给亦有余”;任宾客分司时,“俸钱七八万,给受无虚月”;任左拾遗时,“月俸禄纸二百张,岁愧俸钱三十万”;兼任京兆尹曹时,“禄禄二百石,岁可盈仓囤”;担任河南尹时,“厚俸将何用,闲居不可忘”;任太子少傅分司时,“月俸百千官二品,朝廷雇我作闲人”。当时一万钱大概相当于十贯,即十两银子,如此白居易的工资就不难算出来了。

那么,苏东坡收入有多高呢?元丰二年(1079)乌台诗案后,苏东坡被贬谪黄州,授检校水部员外郎、充黄州团练副使,本州安置,不得签书公事。据《文献通考》记载,元丰改制前,团练副使从八品官员的俸禄为“禄米每年62石,月俸650钱,食料每月300文”。苏东坡贬官黄州时,一家数十口一个月的开支只有4500钱,即4.5贯,他在给秦少游的回信中说:“初到黄,廪人既绝,人口不少,私甚忧之。”度囊中尚可支一岁有余”。苏东坡远贬海南后,曾写信向友人发牢骚,说朝廷还欠他三年的俸禄(共两百贯)呢。可见北宋官员俸禄优厚之说,并非全然。

洪迈在《容斋五笔》里记载,“东坡云:‘公(白居易)廪有余粟,府有余帛。’殆亦不然。”苏东坡看到的是白居易为官越做越大,联想自己做官越做越偏远,焉能不羡慕?但他没有看到的是白居易达观、乐天的性格掩盖了他生活上窘迫和艰难的一面:退休后白居易“先卖南坊十亩园,次卖东都五顷田。然后乘卖所居宅,仿佛犹得二三千……但恐此钱用不尽,即先朝露归夜泉”。白居易窘迫到盘算卖地卖房,却偏偏要省钱用不尽。可见,白居易能引起苏东坡艳羡,实在是他“装阔”装得太巧,这种“装阔”是他安贫乐道、自娱自乐的写照,如他诗中所言“心足即为富,身闲乃当贵”。

即便如此,白居易一生诗酒优游、潇洒旷达,趣味一点儿不输苏东坡。如同从同州刺史改授太子少傅分司后,白居易作诗道:“歌酒优游聊卒岁,园林萧瑟可终身。留侯爵秩诚虚贵,疏受生涯未苦贫。月俸百千官二品,朝廷雇我作闲人。”

白居易显然深受儒家思想的熏染,前半生强烈的兼济之志,与后半生坦然的独善之乐,以及由此导致他政治上渴望一展抱负、生活上又追求通达俊赏,两者在他身上并不矛盾。

白居易自撰的《醉吟先生传》生动地叙述了自己的半隐居生活:“洛城内外,六七十里间,凡观、寺、丘、墅,有泉石花竹者,靡不游;人家有美酒鸣琴者,靡不过;有图书歌舞者,靡不观……每良辰美景或朝朝月夕,好事者相遇,必为之先拂酒壘,次开诗篋,诗酒既酣,乃自援琴,操官声,弄《秋思》一遍。若兴发,命家僮调法部丝竹,合奏霓裳羽衣一曲。若欢甚,又命小妓歌杨柳枝新词十数章。放情自娱,酩酊而后已。”白居易这种诗酒优游的生活,完全看不出诗人内心的苦闷,以至于后人称“乐天富贵色色可谓至矣”。

这种富贵才是真正的精神上的富足,也正是白居易这种乐天风范直接开启了中唐以降文人“居官亦行乐”之风。然其实,白居易的诗酒生活清雅不俗,游赏、听琴、观书、吟咏,皆为雅事,无关奢靡。即便仕途未尽其志,也不妨碍他做“世间第一有福人”,为中国文化史上罕见之有趣灵魂。白居易与苏东坡,堪称跨越两百余年的文化史上的“联珠双璧”。

梨花风起正清明

——清明传统节日里的文化与温情

卜庆萍

介子推忌日禁火寒食,以此寄托哀思,寒食节由此诞生。起初,扫墓祭祖是寒食节的核心习俗,而上巳节则主打踏青祈福、临水祓禊,由于两节与清明日期相近,习俗相互交融,历经汉、唐、宋的演变,最终三节合而为一,形成了如今兼具肃穆与欢愉的清明节。唐玄宗时期,朝廷更是将寒食扫墓定为礼制,进一步强化了清明祭祖的文化内涵。

清明节的习俗丰富多元,完美平衡了缅怀先人的肃穆与亲近自然的欢愉,两大核心主题贯穿古今。扫墓祭祖,是清明最庄重的习俗,也是中华民族孝亲敬祖、慎终追远的直接体现。每到清明,家家户户都会携供品、纸钱前往先祖墓园,清理坟头杂草、添土培坟,擦拭墓碑,敬献花果、焚香祭拜,用朴素的仪式缅怀先祖、寄托思念,诉说

仲春与暮春之交,春雨淅沥,草木萌动,梨花随风轻扬,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如期而至。作为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,清明独具特色,是二十四节气中唯一一个兼具自然节气与人文节日双重属性的日子。它承载着中国人慎终追远的家国情怀,也藏着亲近自然、顺应时节的生活智慧,历经千年传承,早已融入民族血脉,成为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印记。

清明的由来,藏着时光沉淀的演变与深厚的文化渊源。从节气层面而言,清明是反映物候变化、指导农事的重要节点,《岁时广记》中记载:“万物生长此时,皆清洁而明净,故谓之清明。”春分过后十五日,气温稳步回升,雨水日渐充沛,大地褪去冬日的萧瑟,万物焕发生机,田间农事也随之进入繁忙阶段,民间自古便有“清明前后,种瓜点豆”“植树造林,莫过清明”的农谚,足见清明节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指导作用。

而作为人文节日,清明的形成离不开寒食节与上巳节的融合,其中寒食节的渊源最为深远。相传春秋时期,晋国公子重耳流亡在外,历经磨难,臣子介子推不离不弃,甚至割股奉君。后来重耳登基成为晋文公,封赏群臣时却遗忘了介子推,而介子推淡泊名利,携母隐居绵山。晋文公为逼他出山,下令放火烧山,却不料介子推与母亲抱柳而亡。晋文公悲痛不已,遂下令在

鞠、拔河、斗鸡等活动,更是让清明充满欢声笑语,让节日在哀思之外,多了几分鲜活与热闹。

时令美食,也是清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,处处透着顺应时节的生活哲学。受寒食节禁火习俗影响,清明饮食多以冷食为主,各地风味不尽相同,却都饱含春日气息。江南一带的青团是清明美食的代表,用鲜嫩艾草榨汁和面,包裹豆沙、芝麻等馅料,色泽青绿、软糯清香,一口下去满是春日的味道;北方则有吃子推燕、馓子的习俗,子推燕造型精巧、馓子金黄酥脆,十分可口。此外,醴酪、清明粿、蒿饼等时令吃食,也都是清明独有的味觉记忆,承载着地域文化与节日温情。

时至今日,清明节的文化内涵不断升华,习俗也在与时俱进,焕发新的生命力。2006年,清明节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,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。

一场清明雨,一缕故人情;一次春日行,一份民族魂。清明节,是对过往的回望,是对先祖的告慰,也是对生命的敬畏。它教会我们不忘根源、心怀感恩,也提醒我们珍惜春光、向阳而行。在这个兼具哀思与生机的节日里,我们循着传统的足迹,传承千年文化,感悟生命真谛,让慎终追远的情怀、热爱生活的态度,在岁月流转中生生不息,成为中华民族永不褪色的文化瑰宝。